

小院春秋

谢其章

我在北京曾经住过两个四合院，一个至今尚完整地存在，一个已经完全不存在了。存在的这个院子，唤不起我一点儿的记忆，因为那时候我还不到一岁。那个已经不存在的院子，却完整而清晰地存在我的记忆里。

1950年代初，父亲母亲带着姐姐和我从上海迁居北京，刚开始父亲单位将我安排住在东城西总布胡同7号，7号是个两进的院子。十几年前父亲和姐姐重返7号院，与现在的住户聊了很久，还拍了合影。前几天我忽然在《北京四合院普查成果与保护》一书里看到7号赫然在焉，是这样说的：“二进院正房三间，前出廊，明间吞廊，硬山顶，清水脊合瓦屋面。”我家住正房西间，“明间吞廊”即中间那间凹进去一块，正好给西间和东间留了独立的门。“明间吞廊”样式的房子，我见过的很少，其实我没有真正住过，父亲说我和妈妈住在院子另外一间房子。

家里有一本老相册，其中一张老照片的谜最近才解开（见右图）。照片是120相机拍的，房门前三层石阶，错落站着四排小孩子，惟一坐板凳的是我，抱着个饼干筒笑着。第二排是四个小女孩，姐姐在内。最后一排站着个穿旗袍的阿姨，高个子，睥睨地望着镜头。我一直以为这是一张托儿所的照片，误读了几十年。最近偶然跟父亲说起，他告诉我这些小孩，都是他单位同事的孩子，都住在7号，那个高个子阿姨并非托儿所阿姨，是某同事的爱人。父亲的记忆力真是惊人，他还指着阿姨前面的那个小女孩说，她后来演过电影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。我马上在电脑上调出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来看，一下子就对上号了，这位小女孩就是饰演韩小燕的王俊童。韩小燕那句台词多脆生，冲着周大伯（邢吉田饰）嚷：“光顾杀棋，回头就别吃（饺子）！”

7号院住了不到一年，单位将父亲安排到西城太平桥大街的按院胡同60号。60号在路南，北京的好宅子讲究坐北朝南，因此路北多为高门大户的院子，西总布7号在路北。父亲进了按院胡同以为60号也像7号似的气派，跑到路北的一家大宅门啪啪拍门，出来一个门房告诉父亲找错了门，60号在对面路南呢。

在老北京，能够横跨两条胡同的宅子才算得上“庭院深深深几许”之豪宅，父亲拍错门的那座大宅，前门在按院胡同，后门开在学院胡同。按院胡同是东西向，里面还穿插着几条南北向的短胡同，60号就在短胡同里，很隐蔽的大门又在短胡同里拐了个小弯。按院胡同在明朝的时候叫“巡按察院胡同”，因“巡按察院”衙署而得名。经历几百年沧海桑田，最初的房屋院落大变模样，不变的只是胡同的东西走向。据我的考证，60号的房子是1926年建造的。

60号院子的格局是这样的：门洞右手是一小间，约六平米。门洞往里迈上两步就是西房的山墙，山墙上做了个“假”影壁。再往左拐两小步是两间小房子，一间六平米吧，另一间三平米有门没窗，后来才知道这小间原来是茅房。可别小看这三间小房，它们可都是朝阳的，每天日照不少于四小时吧。西房三间和南房五间里的



照片是120相机拍的，房门前三层石阶，错落站着四排小孩子，惟一坐板凳的是我，抱着个饼干筒笑着。第二排是四个小女孩，姐姐在内。最后一排站着个穿旗袍的阿姨，高个子，睥睨地望着镜头。我一直以为这是一张托儿所的照片，误读了几十年。

一间半共同组成了60号的外院。父亲单位分配给了我西房三间和门洞左右两小间。四口人加上奶妈和保姆，住得还算宽敞，父亲尚能布置出一间书房。厨房设在门洞右手那间，窗下有个自来水龙头。左手那小间或奶妈住或保姆住。外院和里院隔着一道墙，中间有个漂亮的月亮门，外院曾经植过一丛翠竹，这些美景都是大人讲的，我不曾记得。

里院由北房三间，东房两间，南房三间，另有几间很小的耳房围成。房东住大北房，我不曾记得进去过。四合院，潜移默化地教会你明白等级的存在。整个院子只有外院有一棵树，一棵枣树。秋天果实累累，终于有一

天房东太宣布打枣，房东一家人连打带冻，然后赏给每家一小盆。父亲讲东房曾经一度租给我家使用，房东大儿子结婚客人多还借东房摆了两桌酒席。老北京有个讲究“有钱不住东南房，冬不暖来夏不凉”。60号的东房夏天很遭罪，西晒使得屋子像蒸笼，南房相对好一些，而且南房是全院惟一有后窗户的屋子。南屋后窗户外面是个夹道，夹道的那边是所著名的中学校，院子里学习好的男孩子考上这所学校，课间休息十分钟都来得及跑回家一趟。我弟弟是196分考进去的，近有近的坏处，弟弟的同学一放学先到我家聊天，弄得人声鼎沸，然后一哄而散。弟弟同学的名字及编号至今

我还能记住不少，他们也始终没有忘记我，一种别样的温馨记忆。

有那么两三年，院子里家家栽葡萄，北屋和我家是紫葡萄，南屋栽的是绿葡萄，小颗粒，比紫葡萄串紧密，甜中带酸。有一年，我家葡萄丰收，正赶上老邮递员来，真诚地请他吃上一串。父亲在外地工作，所以我家信和汇款单比较多，从小听惯了邮递员的喊声“某某某，拿讫！”

说起葡萄，还能勾起一件往事，我家保姆把我们从小带大，后来她去南郊果园工作，每年初秋都忘不了送来一大筐的葡萄，大吃特吃，真过瘾，那时候的葡萄似乎比现在的葡萄味道正。

有一年，我家在窗前种了几株老倭瓜，这种瓜很好养，不用精心伺候，旱涝不计，院子地方小，它的秧子爬上房顶一样果实累累，华于春者实于秋，大小一共结了32个瓜，姐姐挑了一个最大的送给小学校老师。

60号小院三十多年的生活，以我到农村插队为分界，上面所说为前半截。我插队之后每年冬季农闲回家一趟，住上三四个月。此时的小院发生了很大变化，新的住户多了两家，里外院的隔墙拆掉了，旧的称呼“太太”

“马妮妮”听说我回来探亲，颤巍巍地来问问我：“大弟回来了，那边生活怎么样？”这一年的二月，母亲去世，家里只剩了上初中的小妹，五间房只好退租了三间。退掉的三间马上住进了三家。几年后我们返城，两间房一时人满为患，行军床派上了用场，我呢，则尽量争取在单位值夜班。日子像流水一样的一天重复着一天，直到我在小院结婚生子，终日菜米油盐，锅碗瓢盆，连果实累累的枣树竟亦无暇抬头望上一望。

笔会

天边的云彩

（装置）

唐承华



一座很像大脑的建筑

毕淑敏

瑞士歌德大殿，据称是一座很像大脑的建筑。未去前充满疑惑。我当过医生，知道人类大脑的解剖，想不通一个冰冷建筑，何以比拟大脑？有脑积液？有脑沟回？有神经中枢和网状纤维？……

人们多以为这座建筑，得名于歌德。其实他老人家根本不知道大殿的存在。约翰·沃尔夫冈·冯·歌德生卒年是1749年8月28日到1832年3月22日，活了83岁，在那个年代要算高寿。即便如此，那时歌德大殿还踪影皆无，它只是瑞士巴塞尔地区一块名叫多纳赫的荒凉山坡。大殿完工于1928年，不但距歌德逝世96年，就连大殿的设计者——鲁道夫·斯坦纳先生，也已去世多年。

斯坦纳1861年2月27日生于奥匈帝国。1882年，21岁的他，意气风发地编写了一本关于歌德科学研究内容的《歌德科学》。魏玛档案馆注意到这本书，于1888年录用了斯坦纳，让他专门编辑歌德与席勒的著作。歌德成为斯坦纳建构自我世界的精神导师，他想修建一座建筑，向自己引路人致敬。

斯坦纳的建筑哲学被称为“有机建筑”，它包括硬结构、心理氛围及生活在其中的人之活动诸方面。斯坦纳设计的歌德大殿蓝图，最早是木制结构。不料整体完工的第二天，被狂徒人为纵火，将大殿毁于一旦。斯坦纳立刻决定原地重建，一切照旧，只是改为水泥材料，以防再次被毁。那个时代，欧洲的建筑元素都是尖顶、曲线，巴洛克……歌德大殿的不规则外形，特立独行的外立面，惊悚骇俗。

这里至今还是斯坦纳一手创立的人智学工作总部。迈上台阶，人们鱼贯地从大殿敞开的“嘴巴”进入其内。它的外形，完全模拟人类头骨框架。正确地讲，是一具剔掉了所有皮肤肌肉和筋膜的头骷髅。大殿匀称分为左右两部分，主门之上，是水泥制造的颞骨和颞骨，正上方是额骨，顶部为颅盖。在相应比例位置，有代表人类眼睛耳朵的空洞，装饰成窗户。大殿毫不隐晦地象征——我是坐落在大地之上的巨型人头。人一旦进入，瞬间被它吞噬，进入神秘怪诞的世界。

这个奇异造型以强烈震慑感，完全摧毁了人们对于庄严殿堂的常识。不过进入之后，并不恐怖。它内部雄伟坚实，布局规整，让被吞噬进来的人，不由自主安静下来。扑面而来的色调，是温馨的粉色鹅黄等暖色（模拟人的口腔和咽喉粘膜吗？），灯光柔和地面雅洁，十分宜人（口腔卫生很不错啊）。

我在世界各地，凡看到建筑物，都要尝试判定它的方位。不过依山傍水的外国建筑，常常端不端正不正，

歌德大殿是一个例外。它正门朝西，殿内分为两个相等的部分，各呈半球状，代表着人的大脑结构，也象征地球的东西半球。

斯坦纳天才地把建筑变成了富有象征意义的童话。人们在无意识中接受了强烈暗示：人类是紧密连接的整体，东西方互相依存密不可分。

在歌德大殿的漫步，像沿着人的脑回路，在巨人的神经中枢游走。这比喻说来可怕，实际并无狰狞违和之感。大殿内部，犹如胖娃娃的温暖肉身，所有拐弯抹角处均是带有稚气的圆润曲线。高处的彩色玻璃窗，把自然光的颜色和触感滤得柔和细腻，让混凝土涂层笼罩在温暖暖意中。朦胧光影，让你生出小鸡身居蛋壳内的安全感，激起神秘感动。

我不安分地跑来跑去，一会儿走出这个门，一会儿钻入那个大门，用已知的头颅解剖学知识，一一对应大殿的结构。它的主体分为两层，有楼梯通往上层主会场。途中，从蓝框玻璃中透视山野，如同人的眼眸微睁。楼梯最上层，经过暗红的彩色玻璃窗构成的空间，意味着从这里你离开自然开始进入心灵世界。主会场的形状

说方不方说圆不圆，有1400个座位。两侧各有七根柱子，宏大的有吊顶，设计巧妙，听觉极好。

下层有两个小会场，办公区色彩缤纷。会客厅黄色，走廊粉红色，卫生间鹅黄色……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餐厅，一是它被涂成辣椒般的红色，二是所供应的冰激凌均为有机食材制作，极为好吃。

和随处可见的精雕细刻和色彩精心搭配形成鲜明对比的，是西侧主门厅和通往二层的主楼梯室内面，直接以混凝土的灰白本色示人。细看似乎还遗有工匠涂抹水泥时不均匀的毛糙擦痕。

我悄悄问工作人员，是否大殿修建到这儿，经费不足，改用清水混凝土，以节约成本？

陪同是位热心大妈，耸耸淡淡眉毛，说，不是经费的问题，是特地留下这种质朴的原生态。这与斯坦纳对空间色彩的定位有关。他认为色彩与宇宙结构和人类心灵，都有直接关联。色彩能够激发人们的心灵力量，从而加强对更高层次知识的理解。当时，在建筑上占统治地位的是工业化的包豪斯学派，清冷理性硬邦邦，直线条

故乡祖屋后院一片林子里有两棵老柿子树，每到秋天，一树树斑斓的柿叶，在风中呢喃，恣意摇曳，很是养眼。那些熟透了了的柿子，一个个红彤彤如大红灯笼满树满枝挂着的时候，也是母亲最为开心的时节。母亲常将熟透的柿子摘下赠与左邻右舍分享，慷慨的幸福和分享的喜悦写满母亲和善的面庞。2016年回老家，我和哥哥、姐姐到祖屋看了看，老柿子树仍硬朗健在，只是当年喜爱它们的母亲离开我们已经多年。

2006年平安夜的早晨，母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直到生命最后一刻，姐姐们才贴在母亲耳边大声告诉她得的是什么病，老人听后顿时一脸释然。从不抽烟、偶尔喝点小酒、生活极有规律的母亲得的竟是肺癌。这让我们多少有点意外也于心不甘，其后虽多方求医，无奈回天乏术。我们兄弟姊妹商量决定：保守治疗，不手术、不放疗、不化疗，让母亲生命最后时光，享有该有的尊严和质量。

母亲是坚强的。兄妹八个，母亲排行老三，是家中独女，外公外婆视若掌上明珠，以至怕私塾先生责罚，竟连书也没让她读——这是一生要强的母亲对外公外婆唯一的埋怨。自打17岁走进任家，母亲便告别了衣食无忧的日子。奶奶过世得早，她早早挑起“长嫂如母”的重担，起早摸黑，忙里忙外，出庭院，下厨房，将爷爷、父亲和两个叔叔四个老少爷们的饮食起居料理得利利落落。日常缝浆晒操之余，还帮着耕地种菜，养鸡养鸭。原本暮气沉沉的家，硬是让母亲操持得风生水起，直帮到两个叔叔相继娶妻生子，成家立业，赢得了乡邻们的一致夸赞。

母亲的吃苦耐劳和能干，在远近十里八乡是出了名的。随着我们五个孩子的相继降生，头顶“光荣妈妈”光环的母亲，又一头扎进新一轮操劳与辛苦之中。父亲长年工作忙，少有精力顾到家里，养育我们的任务自然落在母亲的肩上。即便是三年困难时期，一家老小在吃糠咽菜中度日，母亲宁愿自己喝凉水，从牙缝里省下点滴滴，也从不在家人面前叫苦喊怨。同样度日如年的外婆，多次捎话让母亲带孩子们回娘家过一段时间。倔强的母亲不肯，发誓一家老小“生要生在一起，死也要死在一块”。拗不过母亲的执拗，外婆只好让大舅不时匀些粗粮送来接济青黄不接的家。此后，日子虽稍稍好过些，母亲仍时常在劳作之余，勤拾田埂地头的爬根草，还会到别人收割过的田地里捡拾谷穗草，翻寻田垄里落下的山芋、土豆等聊补家用。在越堆越高的柴火堆面前，母亲的身板变得越来越瘦小。母亲在灶膛里、暖火盆中点燃的柴火，成了那个年代一家老小可以紧紧依偎的温暖臂膀。母亲用她乐观向上的精神，带领我们家度过了一个个困苦日子，而那些支离破碎的日子却因了母亲的勤劳、坚韧显得格外幸福、明亮。

我在母亲临终前的那年深秋回去陪过老人一段短暂时光。很少回忆过去的母亲，跟我唠叨起了陈年往事，忙过年是她多次提及的。腊月，酿米酒、蒸糯米、做炒米糖、磨豆腐、掸尘迎新等等，是母亲一年中最忙碌也是最快乐的家乡年俗，孩子们大年初一早晨穿着新衣穿新鞋过新年。然而，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五个孩子的新鞋、新衣上身谈何容易。母亲的女红在家乡是出了名的，用今天的话来说，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时装设计师。为了过年，母亲从夏便开始忙了——先是将各方搜过来的碎衣零布用糨糊粘起来，反复晒干后，依各人脚型裁剪成相应鞋样，再用闲暇时间，纳成一个厚实温暖的鞋底。无数个夜晚，豆黄青灯下，母亲穿针引线的情景历历在目。她做的鞋曾被左邻右舍的姑嫂姨婶们当作模板。我排行老么，我的新鞋或新衣，母亲也往往是在年夜饭后才缝完最后一针。心灵手巧的母亲为了让新衣看起来挺括，会烧上

硬着陆，千篇一律。歌德大殿完全反其道而行之，室内家具，灯具，门窗，楼梯扶手等，基本上都是折线和曲线，流露情绪表达温暖。这样才能让人放松，进入思考。

斯坦纳和他的追随者们，力图用歌德大殿的结构和一切细节传输这样的理念——人与自然之间，地球东西方之间，人的头脑与身体之间，要找到有完美结合的平衡支点。

遥想那时，尼采喊出“上帝死了！”不过，上帝死了之后，人还要继续活着。那么，人该如何活下去？当时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们，都认为自然科学只能研究物质世界，而任何涉及精神生活的研究只能是宗教信仰，科学无缘言说。

斯坦纳认为：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精神领域。人的精神自由和独立，是精神发展的首要条件。通过适当的教育和自我改造，最终可以培养出具有完全开放的胸襟，既不盲从也不随意拒绝的新人。当人的内心有所需求，知识和智慧就会涌现，获得精神世界的共鸣，获得具有超越物质、欲望和情感的洞察与判断力。结合与生俱来的智慧和本质达成自我，找到自我定位和人生方向。

斯坦纳一手设计的脑型建筑，便是为这个理念所做的形象注脚。我轻轻抚过大殿中的木雕，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流淌和无数手指的触摸，让它们有了旧丝绸般的生命。它们温润而光滑，好像斯坦纳的灵魂注入其内。脑型建筑，成了他独特思想的辉煌容器，是他哲学观念的立体表达。

一大壶滚烫的开水，倒入平底搪瓷碗中，将新衣衫一一熨平整好，显得格外不同。守岁之后，她还会在早已进入梦乡的儿女的枕头底下放上几张崭新角钞——我们心仪已久的压岁钱。初一大清早，放好开门炮仗，母亲便将卤好的五香茶叶蛋一碗碗分好，让我们趁热给左邻右舍送去拜年。病中的母亲回忆起那个物质匮乏却情意满满的年月，满是皱纹的脸上会漾起难得的笑容。

上个世纪艰苦奋斗、艰苦朴素盛行的年代，身为公社领导的父亲，面对上级来人或下级来访，只要到了吃饭点，便常在家里茶饭待之。即便是粗茶淡饭，对我们家来说也是个不小的负担。为此，母亲想方设法节衣缩食、开荒种地，贴补家用。房前屋后的河塘、竹林成了母亲的家畜饲养场；驻地附近一片撂荒地，也被母亲改造成菜地，起早贪黑种上各种瓜果蔬菜。由于经常来人吃饭，计划配给的粮食难以维持，我们便时常依赖母亲种的山芋干、南瓜饭、黍米汤圆果腹。物质供应匮乏的年代，母亲私下也偶有怨言，但从不在脸上，她以自己的聪明和热情，尽情招待来客。频繁的接待让父亲单位里的同志过意不去，戏称我们家是“人民公社小食堂”之余，多次提出要给一点粮票和钱款补贴，但总被母亲以“吃好粮票别嫌怪，公家的便宜不能占”婉言谢绝。母亲的任劳任怨、好客和能干为她赢得了“阿庆嫂”的美誉，在当时，这可是对能干家庭主妇的最好夸奖。

母亲对我们几个儿女要求也是宽严有度。未读过书的母亲对我们读书方面提出的要求，总是尽可能满足，别则是能省则省。至今清楚记得，小时候，光连环画就给我买了百多本，但我年少时走亲串友的时还是向邻居家借的。大哥上高中时，社会上流行海魂衫，爱美心切的大哥写信央求在省城工作的小舅给买了一件。收到衣服后，大哥兴奋之情可想而知，但只敢在学校里显摆，从不敢在家里穿。纸终究包不住火，不久这事不知怎么被父母知道了，气得父亲拿着竹扫帚要狠揍大哥，被母亲拦下。母亲一番动之以情、晓之以理的数落，让还想争辩一番的哥哥彻底没了脾气——彼时小舅刚工作不久，且正和女友谈婚论嫁，手头之紧可想而知。此事最后以大哥海魂衫被没收，每月的饭钱被扣至还完购衣款而告结束。

每年暑假，雷打不动要我们回乡下舅舅和叔叔家，帮助干力所能及的农活，是当时家里惯例。母亲这么做，一是希望我们不要忘记本，吃得苦，经得住累；二是让我们在劳动中增强生活本领，经风雨见世面。所以，每每听到乡亲们夸赞我的哥哥姐姐们干得一手好农活，母亲很以此为骄傲。清白做人，踏实做事，更是父母亲营造的不变家规。父亲后来调到区里和县上工作后，仍常有人来看望，来人少不了带些土特产，基本都被母亲挡在了门外。“吃人家的嘴短，拿人家的手软”是母亲常唠叨的一句话——这么做不是不尽人情，主要是大家的日子过得都紧巴，不能再给人家添负担；至于那些上门求父亲办事帮忙的就更不能收，“不收，你父亲能帮的帮，帮不了的也没负担。”母亲用自己朴素的言行时刻教育影响着我们，也为父亲一生清廉工作把好了妥妥的“家庭关”。及至后来我们兄弟姐妹相继走上不同工作岗位，母亲每见到我们，总不忘反复印儿几句，要求我们一定要“清清白白做人，老老实实做事”。做个能安安稳稳睡觉的人。

2018年秋天，我又回到故乡。再次站在老柿子树下，看到老柿子树上片片斑斓的树叶在秋风暖阳中缓缓凝固，欢舞飘落，我像看到母亲因为游子的归来，借助风的手不停地在我的脸庞上亲吻抚动。那些在风的琴声中低吟浅唱，缓缓移动着舞步的落叶，正静静地诉说着自己一生的美丽。斑斓的落叶没有哀愁，她懂得如何在秋风中欣赏自己，抚慰儿女：一朵红晕，一声感叹，一份誓言，一片深情，一生挚爱。那是风中的母亲写给我们这些儿女的诗。



「文汇报」 微信二维码